

论哲学创新的根据与原则

刘长欣

(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摘要] 哲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与灵魂,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意义重大。也正是因为如此,其严肃性非同一般。哲学创新固然需要人们智慧而大胆地突破,但决不允许人们无依无凭地杜撰。哲学创新必须以生存智慧的追问、具体科学的基础、文化传统的渊源、外来思想的借鉴、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根据,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科学、批判继承、取长补短与经世致用原则。

[关键词] 哲学;创新;根据;原则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76-05

一、生存智慧的追问根据与实事求是原则

哲学,从其古希腊语的词源意义上讲,是人们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一门学问。哲学所追求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正义和其他德行都是智慧”^{[1]193},或更为简单地讲“德性就是智慧”^{[1]6},这和中国的智者老子的看法不谋而合。“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至善的道德就是人们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而人们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因此,简单而言,智慧就是人们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

许多人将聪明与智慧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大而言之,知“道”曰“明”,合“道”曰“智”或“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据是知“道”与合“道”,仅仅知“道”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不难看出,知“道”的聪明只是合“道”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最后的合“道”才是智慧的关键所在。

“道”是公认的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道”既具有西方哲学本体、本原之含义,又有法则、规律之含义,当然还有其最初的路径、方法之含义。

人们如何才能获得智慧或者说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这首先就需要人们

通过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求道、得道,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则、规律的要求形成正确的路径、方法以妥善解决人们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哲学研究或创新要想完成人类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学科任务,首先应该坚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所求的“是”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客体存在或客观事物的规律或规律性。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人们要想达到合“道”的智慧,首先要对规律性的“道”作形而上的探求与把握,进而达到知“道”的正确认识,这是人们行为合宜或智慧的理性前提,没有知“道”,就无法自觉合“道”,人生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许多闹剧或悲剧多由这种不知“道”的无知进而跟规律或法则对着干的愚蠢所造成的。

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所求的“是”其次是求“善”,即求得主体存在或主观行为的合宜性或合理性。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实事’是指现时代条件下获得的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求’是指研究(包含探索),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就是实事中的规律系统与合乎规律的规范系统。简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对于主客观事实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获得对象的规律性知识和规范化技术。”^[2]

[收稿日期] 2011-09-30

[作者简介] 刘长欣(1964-),男,河南叶县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伦理学。

由此不难看出,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仅仅求“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哲学不仅要为人们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说明,更要为人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方法指导,因此,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不仅需要有形而上求“真”的理论探求,更需要有形而下求“善”的实践关怀;不仅要通过认识实事中的规律系统、获得对象的规律性知识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更需要依据正确的世界观确立合乎规律的规范系统或规范化技术即正确的方法论约束、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基于自然、依据必然、达到应然,达到“德性”即“智慧”的境界,也唯有如此,哲学才能与一般科学区别开来。

总之,哲学是一门以探索世界的本原、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为形式,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人们通过这种实事求是的哲学努力所形成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才体现出人们正确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的生存智慧。

二、具体科学的基础根据与立足科学原则

作为人类最为高深的学问,哲学首先要研究、把握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在求“真”的目标上,哲学与具体科学携手并肩,因此,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离开了具体科学,哲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

列宁曾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因此,哲学的论证可以理解为哲学前提和其他科学的确定规律对照,或者是运用这个理论的经验。”^[3]事实正是如此。张东荪先生曾经指出,西方“近世哲学之兴起,全由于科学之兴起。科学自古有天文、地理、物理等,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科学勃兴,有大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科学产生后,就有了宇宙观,对物质有了一个看法,遂与中世纪耶教圣经上的说法起了大冲突,西洋文化本身因此有了矛盾,整个文化变得不调和,于是而有了思想上的烦闷,影响到生活上也有了烦闷,于是产生了思想家,即近世哲学家。哲学家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中增加了新的素质,对新兴的科学潮流加以吸收,而不是迎头痛击。同时对于过去一直赖宗教

以维持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观念加以种种解释,西洋文化因而起了巨大变化。”^[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更是人类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或变革,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从19世纪初期开始,自然科学已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一些以研究自然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学科,如地质学、胚胎学、动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等,都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细胞学的创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三大科学发现中的前两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前提,后一项则为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论证。总之,“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5]。

除了自然科学之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伦理学以及一些跨学科科学,也都是哲学发展的科学基础,这些具体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为哲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养分”,另一方面又为哲学创新提供了最坚实、最可靠的论证与说明。因此,哲学创新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科学基础之上,必须遵循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

三、文化传统的渊源根据与批判继承原则

哲学的创新除了具体科学的基础作用之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据就是文化传统中的哲学思想的精华。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6]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在继承与创新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学术研究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即通晓历史与传统。为学之道,只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增删,有所损益。学术创新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智慧阅读,尤其是对元典文本的创造性诠释及其诠释方法的推陈出新而获得的。传统学术是思想发展的必要来源,是创新思想的生长点。没有传统学术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现代学术。^{[7]13-18}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在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文

化传统的思想认识中,虽然有一些内容或许已经丧失了其时代根据成为历史垃圾,但有许多文化传统的思想认识如儒家的仁爱精神具有超越性与普世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文化不断继承、创新的历史。历史不容割断,文化创新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现代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贺麟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正确地论述了文化传统对文化创新的这种思想发展历史的渊源关系,明确指出应从检讨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8]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伟大成就的取得就与其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正确认识成果密不可分。全部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以及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对社会历史动因所作的有益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经过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他们师古而不泥古,对前人作了大胆的批判继承——在理论上,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吸收了它的唯物主义精粹。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发现,创立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

熟悉中国哲学的人们知道,《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较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的重要哲学论著,它发端于春秋末年,成书于战国前期,是中国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哲学思维发展集大成之作。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老子广泛地吸取前人思想精华的结

果,尤其与《易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老子在继承了《易经》的阴阳思想、矛盾对立统一思想等积极成果的同时,扬弃了《易经》之宗教巫术的特性,创立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天道观,打破了《易经》机械的框架结构,用哲理诗的形式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总的看法。而与此同时的儒学创始人孔子以及紧随其后的汉代儒学先驱们也通过解释《易经》,形成《易传》,《易传》既继承了《易经》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同时又对《易经》的思维对象和内容作了彻底的更换,使《易》学发生了由最初的宗教巫术向人文哲学的根本转变,从而使中国文化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外来思想的借鉴根据与取长补短原则

以哲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建设需要在纵横两条轴线上同时展开。纵的轴线就是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去粗取精,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横的轴线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取长补短,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在近代中国,由于遭受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是极力盲目排外的“文化复古”,一派是一味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中,鲁迅先生清醒地看到了他们极左极右倾向的错误性,创造性地举起“拿来主义”大旗,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指明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在思想文化领域,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更应该转化为民族的。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财富,大家都有权利分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注重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才能快速发展,不断繁荣,“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只有善于广泛地、不断地学习别人的优点,博采众长,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智慧的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也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整个人类的文明才会日新月异。

当今,哲学发展的整合化趋势也需要我们大力借鉴一切世界优秀哲学思想的文化成果。“哲学家是有国界的,哲学却是无国界的。研究来研究去,古今哲学的融合,东西方哲学的交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形而上学看见本体,辩证法看见运动,唯物论看见物质,唯心论看见精神,道家看到道,儒家看到仁,等等。哲学好比一头大象,各家只是摸住了其中的

一个方面。尽管各家的说法各异,但我们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是诠释了世界的一部分而已。当代哲学,必然是重新审视一切哲学素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哲学整合成一个整体。”^[9]

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外开放的悠久历史和宽阔胸襟。早在盛唐之际,我们就已洞开国门,大量地吸收了西域文化和印度的佛学思想,并使佛学思想中国化、本土化,使之与儒学思想、道家思想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儒、道、释三派之间相互参照,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相互启迪,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向前迈进。宋明理学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人们对先秦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对佛道思想借鉴的共同结果。陈寅恪在论宋学时指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尔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10]近代中国,又有不少仁人志士像当年唐僧取经那样,远涉重洋,到西方去寻求救亡图存之理。正是通过这种“拿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才有了“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不仅经济建设要“走出去,引进来”,实行对外开放,文化建设也不能“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而是要努力吸收一切文化的优秀成分。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1]

每一个民族的新文化,必然是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由此也不难看出,文化创新的核心内容——哲学创新多么地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因此,外来思想的借鉴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根据,“拿来主义”的取长补短也因此成为哲学创新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社会实践的需要根据与经世致用原则

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哲学为什么要创新?哲学为什么能创新?一个最主要、最关键的动力根据就是解决人类社会实践所面临各种问题的现实需要。“学术研究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进行的探索”^{[7]13-18}。

西方哲学由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创出纯粹思辨的哲学传统,这种纯粹思辨的哲学发展到黑格尔时代,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人们认为,只有这种纯粹思辨的哲学才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

要“终结”这种纯粹思辨的哲学,推翻纯粹思辨哲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创立自己的唯物史观,就是因为马克思正确地看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回归到哲学的终极价值所在,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经世致用,实现哲学自身所特有的“武器的批判”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深入研究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在这种研究回答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实现自身的发展。如果不敢或不愿面对现实,回避问题,钻进“象牙塔”搞经院哲学和繁琐论证,就不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就会走进“死胡同”。^[13]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包括哲学在内的文化创新的直接、根本的动力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思想才应运而生。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则主要是基于要回答和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的实际问题。任何一种新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根据现实社会实践的需要,提出一些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是哲学、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是哲学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根据。

什么是哲学?“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著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应该是哲学与哲学家的天职,哲学也因此与一般学问不同,它既有形而上的世界观的追问,更有形而下的方法论的关切,而且最为重要的就是其形而下的方法论的关切,其形而下的方法论的关切主要就是要妥善地解决人生实践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例如,老子《道德经》就既具有形上的抽象的“道”的理论思维,更注重形下的具体的“德”的伦理设计(依“道”立“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学”又有“术”、“学”与“术”完美结合的扛鼎之作,充分体现着老子哲学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的经世致用的一面。黑格尔曾经无知而霸道地讲:“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的”,在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思想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所以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5]。殊不知,恰恰相反,西方自柏拉图始,许多哲学家将哲学研究的视域仅仅投向形而上的局限里,完全抛开巴门尼德所关注的人生、社会、自然

在内的“是者”，根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在“理念”虚幻的世界里“沉思”了两千多年，去追寻那个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本体“是”。哲学思维一旦脱离自然、人生、社会的现实，尤其是脱离人生、社会的社会实践需要，智慧之学的哲学要么变成“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玄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却是不行的，没有实效的”^[16]；要么沦为宗教神学的“婢女”，最终只能遭到人们无情的抛弃或“终结”。

因此，哲学创新、文化创新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必须遵循经世致用的重要原则。

六、结束语

物质与精神的创造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人们的创造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哲学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核心与灵魂，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意义重大，也正是因为如此，其严肃性非同一般。哲学创新固然需要人们智慧而大胆地突破，但决不允许人们无依无凭地杜撰。曾看到有人写文章讲：“哲学创新是一种最原始的创新，最没有任何依凭的，是完全的‘无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相当荒谬的。假如没有根据，假如不讲原则，完全“无理由”地去“创新”哲学，智慧之学很可能会沦为歪理邪说或痴人语梦！

[参考文献]

- [1] 俞宣孟. 本体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 袁玉立. 当代学术要从事求是与致用对立中走出[J]. 云梦学刊, 2009(4): 26.
 [3] 列宁.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

受到的批评[M]//列宁. 列宁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79-380.

- [4] 张东荪. 科学与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89.
 [5]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41-242.
 [6] 恩格斯. 致康·施米特[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03-704.
 [7] 程郁缀, 等. 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主导范式[J]. 云梦学刊, 2009(4).
 [8]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7-708.
 [9] 稷下书生. 浅谈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J/OL]. (2007-12-10).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
 [10]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10-11.
 [11]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6.
 [12]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
 [13] 刘云山. 扎实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J]. 党建, 2005(7): 4-7.
 [14]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2.
 [15]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1卷[M]. 贺麟,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97-98.
 [16] 张岱年. 魏晋玄学的评价问题[J]. 文史哲, 1985(3): 4-5.
 [17]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85.

[责任编辑: 夏畅兰]

On Motivation and Principle of Philosophical Creation

LIU Changxin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ical creation, as the precursor and soul of theoretical creation, plays a grea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 This in turn brings into prominence its serious characteristics. It is true that philosophical creation does require people to pursue the boldest breakthrough,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people can make at will groundless imagination and fabrication. Philosophical creation should ground itself on exploration into the issues on wisdom of survival, basis of science, origin of cultural tradition, reference to thoughts from abroad, necessity of social practice, etc.,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being practical, realistic, scientific, critically inheriting, and that of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s strong points.

Key words: philosophy; creation; motivation; principle